

第一章

中共中央分局向游击 战争的战略转变

第一节 中共中央对坚持中央苏区 斗争的布置

位于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等在该两地地方武装暴动的基础上逐步创建的。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大苏区。1931年11月在这里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全盛时期曾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五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范围最大时包括50多个县。从1930年冬至1933年春，红一方面军先后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创造了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

从1933年9月下旬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经过一年苦斗，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对于长征这样的大事，理应经过党中央政治局

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却不经政治局讨论即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正如博古后来说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①也如张闻天说的：“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行行事。”

对于红军主力长征以后，如何坚持苏区斗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同样应该经过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集思广益，然后作出决定，进行具体部署。然而博古、李德对这一步也同样没有进行。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坚持苏区斗争是有一定的设想，作了一定的布置的，表现在：

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以下简称中央分局）。1934年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主力红军转移前，在江西瑞金梅坑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委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5人。后来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中央分局进一步扩大了组织，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为委员。以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李才莲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

中央分局的领导范围是：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后阮啸仙）；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后钟循仁）；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后叛变，由关英接任）；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后叛变，由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后傅秋涛、涂正坤），另有信康赣雄特委（后称赣粤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边特委)书记李乐天 副书记杨尚奎 杨赣特委 书记王启生(后罗孟文) 公万兴特委 书记徐达志(后胡海)

中央分局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中央苏区周围各游击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残酷“清剿”由于各游击区电台的相继损坏 从 1935 年春开始,中央分局即与党中央及除赣粤边游击区以外的各游击区中断了联系。此后,各游击区的游击战争是在各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的。

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 1934 年 10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 以陈毅为办事处主任 梁柏台为副主任 谢然之为秘书长(后叛变)下辖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刘启耀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吴必先 赣南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钟世斌 闽赣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杨道明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方志敏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后曾国祺 傅秋涛)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均在 1934 年 10 月中旬于瑞金梅坑成立,于本月中旬末移至于都宽田的石含村和龙泉村,同年 12 月底又移至于都黄龙(今黄麟乡)井塘村。

三、成立中央军委。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 中革军委于 1934 年 10 月 22 日电告项英,宣布成立中央军委,以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 龚楚任参谋长(后叛变) 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司令部下设两个科 作战科 科长郭如岳 情报科 科长严重。中央军委政治部下设四部一处 组织部 部长史犹生 宣传部 部长李翔吾 破坏部 部长袁血卒 地方游击政治部 主任袁血卒(兼)秘书处 处长林中伯。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王立中。中央军委是在于都宽田成立的。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规定,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负责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以及直属的

地方部队、红二十四师和红十军。

四、留下了一部分红军。中革军委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坚持苏区斗争，由中央分局领导和指挥。这些留下的部队是；

红二十四师 师长周建屏 政委杨英 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下辖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 全师约 2000 人枪。

江西军区 司令员李赐凡 政委曾山。辖独立第一、二、三、四团。

赣南军区 司令员蔡会文 政委钟循仁（后阮啸仙）辖独立第六、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团、登贤独立团、赣粤边军分区（李乐天任司令员兼政委）杨赣军分区 罗孟文任政委）

闽赣军区 司令员宋清泉（后叛变）政委钟循仁。辖独立第十七、十八团 瑞金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 政委杨世珠）宁化军分区（政委温含珍）

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政委万永诚。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 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朱森 后叛变）阴光独立营等。

闽浙赣军区 司令员方志敏。辖皖南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 政委柳真吾）皖赣独立师（师长匡龙海 政委王丰庆），第三十师（师长倪宝树 政委李伯钧）皖南独立团。

闽北分区党委 书记黄道。辖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 后叛变）政委黄道 兼）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 政委卢文卿。

中央军区直辖独立第三、七、八、九、十一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红十军团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失利后，余部组成浙南挺进师，师长粟裕 政委刘英。

总计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共 1.6 万余人 另有伤病员 3 万余人，^① 总数达四五万人。这些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统称为中央军区守备军。留下的伤病员的大部分后来都补充了红军游击队。

五、留下了一批干部。其中一部分是斗争需要留下的 如项英、陈毅、贺昌等，这部分干部后来在坚持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部分如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等领导干部 由于他们为‘左’倾领导者不喜欢 不批准他们参加长征 排挤他们 而被留下。但这些干部对党忠诚 留下后仍然积极工作 坚持斗争 为革命英勇献身 谱写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六、为留守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规定了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使侵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地统治下去，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然后恢复和发展苏区。同时 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 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游击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中央规定，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必须等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突围到了湖南以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宣布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上述布置中，虽然指出了要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但其目的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并准备配合主力反攻，而没有提出从阵地战、堡垒战、大兵团作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任务。显然在这里‘左’的战略方针仍然在起作用。

在党中央、中革军委对留守人员领导职务的最初安排上，也欠妥当。如主力红军长征这样的大事先不让陈毅知道，待留下陈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第 296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坚持苏区斗争时，告诉他因为他懂军事才留下他协助项英指挥军队。但在安排中央军区领导职务时，却将他排除在外。中央军区 3 个主要领导成员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贺昌两人有政治工作、党团工作和地方工作的经验，却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军区参谋长龚楚懂得军事，但思想不坚定，后来成了叛徒。一个掌握中央军区指挥大权的领导班子，最初没有安排熟谙军事的陈毅参加，不能不是一个失误。

在“左”倾领导者把毛泽东变成空头“加里宁”，把他排挤出中央最高决策核心之外，决定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大事也不得与闻的情况下，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卓越远见，严格履行自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责。在红军主力突围前夕，毛泽东召集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之为“青山会议”），向大家宣布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决定，布置善后工作。他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①

毛泽东还对一些留下的同志进行个别工作。在红军主力转移前，他同曾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被“左”倾领导者打成“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并被批判撤职的张鼎丞进行了一次谈话，建议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②在陈毅的支持下，1934 年 12 月，项英和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同意他回到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游击战争，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资格去指导工作。他回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 72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9 月出版。

到闽西后 与 1935 年春来到闽西的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一起 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使闽西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5 个游击区中最完整的一个游击区。

“左”倾领导者为排挤毛泽东 不让他参加有关长征的决策，于 1934 年 9 月下旬派他到于都搞调查研究。1934 年 10 月 15 日 赣南省委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召开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200 余人。当时地方干部听到了主力红军要突围的消息，他们最关心的大问题是：“主力红军走了 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出席了大会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我们红军。所以 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顺水而出 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到敌人后方去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又说：“主力红军到前方去 不是全部去 还会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后方游击战争。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要留在苏区，团结人民 迅速组织游击队 扩大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要发动群众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你们要迅速担当起这个任务。现在是敌强我弱的时候，我们的主力不能在苏区硬拼，要向外发展。你们在苏区打游击也是这样，敌人力量强，你们不要硬拼，要扰乱它，牵制它；当敌人力量弱时 你们就要有计划的打击它 消灭它。”

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 你们不要怕 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指出了最严重的情况 他说：“同志们 如果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怎么办？你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还要坚持工作。不能搞明的 就搞暗的 你们是贫苦农民的带头人 无论搞工、农、商、学都行 在哪里都要坚持做好党的秘

密工作。”

会后，许多区组织了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苏区被敌人占领以后，他们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支援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夕为坚持苏区斗争留下了一个主要人物：项英。委他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委，使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一个职员家庭。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三大”至“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劳动人民委员及代理财政委员，中革军委委员、代理主席，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34年9月7日，他又代替伤病中的王稼祥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职务，参加了军委的领导工作。

项英在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领导职务期间，为红军的建设和作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他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宁都会议上，他与任弼时、顾作霖一起猛烈批判毛泽东“组织观念的错误”，批判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在会后抹掉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来，项英又批评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

中共中央分工项英留守苏区坚持斗争，一般说来是恰当的，他立场坚定，对革命忠诚，有丰富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经验，有艰苦奋斗精神，善于联系群众，缺点是缺乏深邃的军事战略眼光和具体的作战指挥经验。这个缺点曾使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斗争遭到严重损失，后来在实践的教育和陈毅等同志的帮助下，这个缺点逐步得到了克服。

由于思想上的‘左’倾，在主力红军长征前夕，项英没有去找毛泽东交谈，而是约李德进行了一次个人谈话。1934年10月16日晚上，项英与李德进行了长谈，几乎谈了一整夜。根据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的回忆，这次谈话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关于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的形势。李德说：“项英显得非常乐观”。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的还存在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虽然项英估计到敌人会进占还掌握在红军手里的少数县城和较大城镇，并把沿途的村庄和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到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①这段谈话，表露了项英对苏区面临形势的盲目乐观情绪。项英与李德谈话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待毛泽东的问题。由于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缺乏正确理解，对‘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清醒认识，他担心毛泽东路线重新得到党的确认。他对李德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②李德则“同意项英的疑虑”。在这点上表明了项英和李德思想的一致，表明项英仍然存在‘左’的宗派主义情绪。但是在实践的教育下，他后来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15页～11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②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17页～118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改变了态度，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对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是坚决拥护和认真执行的。这对夺取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卓越的军事家陈毅。

陈毅，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人。1901年8月26日生。1923年秋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后，历任红六军政委、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陈毅以其卓越的指挥艺术和出色的战绩，两次荣获红星奖章。

陈毅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亲身体会到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1934年五六月间，他先后写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战争的检查》等文章，较系统地整理游击队的经验，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然而陈毅的这次总结却为以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作好了思想理论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1934年8月28日上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陈毅亲自到老营盘红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陈毅向红六师作完指示离开前沿指挥所时，被敌弹击中，右胯骨粉碎性骨折，血流如注，顿时倾倒，随即送江西省医院治疗，后又转送中央医院治疗。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恩来来到医院陈毅病床前探望，询问病情。在此之前，身为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并没有人告诉他主力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消息，虽然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主力红军即将转移，许多高级将领来看望他，他也从不打听，以免造成对方因怕“泄密”而陷入尴尬。这时，周恩来告诉他：“红军主力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

能打仗 懂得军事 可以帮助项英。而且你伤势未愈 不能远征。’^①周恩来还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 由项英、陈毅等同志组成 以项英为书记 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

第二天 陈毅见到了博古 博古向他表示歉意 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来看望。接着说：此次撤出本想把你抬走，但因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在中央苏区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你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

这样，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被留下了，这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留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第二节 项英、陈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

在‘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下 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下 中央红军主力 86859人开始了战略转移，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红军游击队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新时期。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苏区红军兵力明显减弱 形势更加严重。蒋介石除抽出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中央军 湘、粤、桂、黔、川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对主力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外，仍然以数十万重兵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敌我兵力异常悬殊。苏区的斗争面临着从阵地战、堡垒战、大兵团作战向游击战实行战略转变的头等迫切的任务。

然而，这个转变是非常艰难的，是在两种战略思想的激烈斗争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页~2页 人民出版社 1982年10月第1版。

中，在敌人的逼迫和教训下，在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后才实现的。

在对待面临的形势和应采取何种战略方针的问题上，项英和陈毅的看法大相径庭。在陈毅手术后的第三天，项英来到陈毅的病床前看望、慰问。他对陈毅非常客气，高兴地说陈毅“留在这里很好”。他们进行了坦诚的谈话，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怎么办的^①问题。陈毅直率地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对形势的估量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保卫苏区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主力红军尚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转移。如今要保卫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反攻，简直是做梦。他认为，过去的大规模根据地、大兵团作战的局面完结了，面临的是大批敌人压境，大风暴随时袭来的新情况开始了，我们要赶快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思想上要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斗争。他说“这次不能搞大的行动，江西总要有个大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江西苏区就会全部被消灭。这次就考验我们在这大风暴里能保存多少。”项英不同意陈毅的看法，认为形势很好，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坚持要保卫中央苏区。陈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失败了硬是不承认，那是十分危险的。”项英认为陈毅“情绪不好，悲观失望”。陈毅说：“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我对革命才不悲观失望，南昌起义的军队上两万人，最后垮台只剩下八百人，我们都不失望。现在我们有几十个县、一万人，还有中央分局，难道还失望吗？我看气魄很大，勇气很大。”

在战略战术和领导方式、工作方法问题上，项英主张搞大兵团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作战 把希望寄托在红军主力的大捷上。他说：“红军主力会在湘西或湘黔边，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待到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 恢复已失的革命根据地。”^① 陈毅不同意这种想法，他主张迅速作好打游击的准备。他说：“过去是大规模根据地 扩大红军 突击征粮 贴标语口号 出报纸 大兵团作战。政府摊开办公 门房收发，签字收据 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 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这一切都要收起，全都不行了。大家穿便衣背起快枪 脱下军装 打游击去 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 三三两两 七个八个 搞它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我们打麻雀战 麻雀几十群、几百群 你能消灭一群 不能消灭几十群，看你怎能抓得完？野战军到湖南 估计站不住脚 因为不能一到就站住脚。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因此 根本不要打算靠主力 只能靠我们自己。”^② 他建议：“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去 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 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他提出：“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 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 他们是吃不消的。”^③

但是项英听不进陈毅的意见，坚持搞大兵团作战，摆大摊子，企图再搞起大的革命根据地，不愿把得力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红二十四师分到各县当游击战争骨干，不愿把较好的武器装备分给游击队。相反 他提出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提出了“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作为中心宣传动员口号。他积极扩充队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 4 页。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 4 页。

伍，把勉强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二十四师，把许多地方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他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再加上 7 个团，这 10 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他准备与敌人打硬仗。

陈毅的主张是富有战略远见的。但是，由于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分局书记，是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他要对中共中央确定的苏区斗争方针和任务负责；由于项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人，对“左”倾错误和危害缺乏认识，因此，他当时没有接受陈毅的正确主张，错过了及时实行战略转变的有利时机。后来，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①

项英受命留守中央苏区之后，他从大局出发，迅速地担当起领导苏区党政军坚持斗争的重任。他指挥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营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并与瞿秋白、陈毅等研究，确定了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各项措施，设法阻击、牵制、骚扰敌人，迟滞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10月中旬，他指挥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活动，开展游击战争，断敌交通，封锁消息，阻滞敌人进攻，以掩护主力红军在赣南的集结、补充，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突围转移。

10月14日，中央分局在瑞金梅坑的马道口召集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开会，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按照中共中央规定，为隐蔽红军主力转移的战略意图，在红军主力进入湖南之前不能公开突围转移的情况，行文和报纸仍用原来名称，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称对外暂时保密。《红色中华》报仍继续照常出版，并在报头上标明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这样，对内有利于安定人心，对敌人可起迷惑作用。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10月18日 项英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 保卫中央苏区》一文 指出：“游击战争是伟大的力量 从发展游击战争中，我们曾经创造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在今天，我们就要以这个伟大的群众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来保卫每个工农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自由 以及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了！”又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最中心的任务。他号召全苏区的工农群众“全体武装起来 组织游击队 加入游击小组 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保卫我们的苏区”。一时间，苏区各地纷纷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消灭敌人，对主力红军的胜利突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妥善安置伤病员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在赣南收容的历次反‘围剿’中留下的伤病员达 1 万多人。轻伤员医好后参加了红二十四师或当地游击队，参加了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斗争。困难的是还有 2000 多名重伤员，他们行动不便，难以坚持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只好进行疏散，安置到当地群众家中。然而他们斗志旺盛 不愿回家 不愿分散 动员他们疏散很感困难。项英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陈毅。

陈毅本身是个伤员，在部队中有很高威信，又是做说服教育工作的能手。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来到了伤员们的住地，走到了伤员们中间，首先向大家亲切问候，然后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讲话。他说：“中央革命根据地暂时失败了，非转移不可，但中国革命肯定要胜利，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险恶，因此对伤员要进行疏散、转移 同志们可以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 打游击也好 种田也好，待革命形势好转时，欢迎大家重回部队。”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疏散以后 要特别珍重 我们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万一遇到敌人，要不怕牺牲，不幸而非牺牲不可时 也只能牺牲自己 千万不能叛变。我们牺牲了 只要有同志

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要坚决相信胜利不属于反动派而一定属于人民。”伤员们听了陈毅的讲话，心悦诚服，愉快地表示服从疏散安置。

陈毅又请来地方干部和群众，动员他们把重伤员抬回去。他亲切地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他们都很年青，要他们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①老百姓抬的抬，背的背，半天工夫就把 2000 多重伤员全部疏散安置完毕。

1934 年 11 月 7 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签署发布了办事处《布告》（第 1 号）：

白军士兵弟兄，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兄弟，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当作牛马畜生。
可恨国民狗党，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洲华北，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冤。
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 胜利就在眼前。

第三节 中央分局开始转变战略方针

红军主力突围后，蒋介石一面组织重兵对长征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命令其“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继续向苏区腹地推进。10月26日敌人侵占宁都。11月1日敌人占领长汀。11月10日，敌人占领了红都瑞金。11月17日敌人侵占了于都。11月23日，敌人侵占了会昌。11月30日敌人侵占了宁化县城。至此中央苏区的县城全部沦入敌手。

国民党军侵占苏区之后，对苏区军民的蹂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每到一地就变成了真正的土匪，烧杀抢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以百倍的仇恨、万倍的疯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阶级报复，活埋、挖心、肢解、碎割，集古今中外一切酷刑之大全。蒋介石狂叫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60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